

脊梁

宋小明^①

中华之幸，在于不论时事多么艰难，众生如何浮躁，总有那么一些人，默默地沉潜于学问，用自己的艰辛增益祖国文化，使之不至倾颓。他们是文化的魂魄，民族的脊梁。

——谨以此题致献敦煌会计文献研究的开创者唐耕耦先生

在我的书桌上，几年来一直放置着一套特殊的书籍，那就是唐耕耦先生主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于我而言，这部五卷本的著作，因为特殊的缘由，已经不只是重要的工具和资料参考，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上的营养与激励。每次翻阅，总是会想到它的作者，著名唐史研究专家、敦煌会计文献研究的开创者唐耕耦先生。猜想唐先生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从数量庞大的敦煌遗书中挑选出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社会经济文书，经过精心的整理、识读及分类，使得散存于世界的这些文书瑰宝，得以整体性地呈现在学者案头，作为研修的必备工具和基础。也自然地想起去家中拜访唐先生，问起当年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和会计文书的情况时，先生泪眼婆娑，欲语还休的神情。

如今，先生已远。但他的心血之作仍在益助后学。而先生计划中并一直期望着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面世，时时思之，不禁既愧又痛。

一、因书结缘

初识先生之名，是在 2004 年初夏。

那时我才通过博士复试，得入恩师郭道扬先生门下修习会计史。一日，接同门来电，要我为导师查找净土寺算会报告资料。经历了不少波折，终于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

^① 工作单位：中国会计博物馆。

室找到《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翻览其中一张张并不十分清晰的图片，阅读其下一字一句细致的录文与注释，瞬间便被作者的功夫所震撼，也因此记住了该书作者唐耕耦先生的大名。

其后研究成本会计史，敦煌寺院经济中的成本控制成为其中重要内容，唐先生的《释录》便成为须臾不离的重要参考，也因此得以仔细深入地研读其中许多重要文书和内容，深深为作者对文书的研究和理解，包括对一些会计专用符号的细致解释所震惊。

再后来，因为参与建设中国会计博物馆，进一步拜读了唐先生的学术论文，包括《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所刊“敦煌寺院会计文书”，更增强了对先生的崇敬之情，心中隐隐将先生看做了未曾谋面的师尊。内心期盼能有机会拜见先生，当面聆听教诲。

先生详细探讨了敦煌会计文书的总体情况、类别归属、各类典型文书的性质及格式特点、研究价值等，并对常住什物交割历、入历、破历、诸色入破历标会牒等典型文书做了细致的举例分析。先生对敦煌会计文书价值的判断，更是高屋建瓴和振聋发聩的。先生认为：“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研究古代社会会计史的稀世瑰宝。”先生在文章中特别说明：“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纷繁杂乱，且多由僧徒剪开后粘贴，已失其原有次序，须要下大力精心整理。以上只是作了概括性的叙述。有兴趣的同道，请参阅拙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二辑，和将要出版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以及正在整理准备争取出版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

于是我到处找寻，想要买到《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并确定《敦煌会计文书集成》是否完成出版。然而遍寻各处，依然无法买到《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后来在敦煌石室书屋买到其他一些新文丰出的敦煌研究著作，唯独没有唐先生的大作，深以为憾。后来得友人馈赠该书电子版，如获至宝。但《敦煌会计文书集成》究竟有没有出版，却一直未有答案。对此疑惑，一直念念，希望能够得见先生，当面释疑。

二、拜见先生

终于有机会面见先生，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意外之喜。这个惊喜在2016年7月15日成为了现实。



2016 年 7 月 15 日于三里河家中拜见唐先生

说起这个机缘，首先得感谢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前所长马德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刘波先生。

几年前，因为研读敦煌会计文书，有幸结识马德教授。其间说起对唐先生的崇敬，表达了希望能够有机会拜见先生的心愿。马老师之前见过唐先生，已经好几年未曾见面了，但知道唐先生近期曾有生病，也想再去拜望。于是托马老师想办法联系，争取早日达成心愿。关于后来的见面，我在工作日志中有如下记录：

2016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

早上收到马老师信息，说拜访唐耕耦先生之事已经联系好。下周五由国图刘波带着去三里河家里拜访唐先生。这是期盼已久的事情。

201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

上周四与王旭一同乘高铁去北京，周五上午 9 时如约到三里河物资大院，由国图刘波带着，和马老师一同拜访了唐耕耦先生。

唐先生 1931 年出生，已届 85 岁高龄。去年中风，但恢复得很好。本拟请他一同吃午饭，家人说不宜外出而放弃。

我向唐先生请教了有关敦煌会计文书研究的一些问题，唐先生一一作了解答。

先生说：以后就靠你们了。一定不能以论代史。

我接着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当年怎么就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会计文书方面；二是对官府会计文书的地位做何看法。

唐先生希望在自己 90 岁大寿时能出个作品集。我与马老师、刘波商谈了其可行性。回来后我负责联系出版社（从先生家里出来即接到立信会计出版社黄成良编辑电话，说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并写报告给学校，希望获得支持。具体成立一个小组，放到会计博物馆文献整理出版项目中做。马老师、唐先生作为顾问提供指导。

日志中记了工作相关的信息，未曾记录的，是我见到崇敬的师尊时那份惊喜，以及听唐先生讲起往事时内心巨大的感触和波动。

现实中的唐先生，因为不久前才从中风中恢复过来，看起来有些虚弱。瘦削的面孔，属于典型的、痴迷学问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多小时的拜访中，谈起之前对照微缩胶片做研究的艰辛，以及研究完成之后出版无门，心血之作挂他人之名才得以面世的种种无奈，先生眼中噙满了泪水。我在平静中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也深深为他感到抱憾和不公。

我特意问到他文章中提到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是否完成，先生只是说没有，却未做解释。这种结果，其实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先生在文章中所写，即是：“正在整理准备争取出版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准备争取出版，短短六个字，道出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所面对的不可为外人道的无奈与辛酸，自然也注定了出版《集成》之愿望流产的命运。

三、学术不朽

回想起来，我与先生完全是因为敦煌会计文书而结缘，事实上也只有过这一次不足两小时的见面。但相互之间，却似乎有着极深的缘分。这种缘分，当是来自对敦煌会计文书的热爱，因为先生在敦煌会计文书整理研究方面的不朽功绩。

先生以一己之力，耗时十年完成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已是不朽的功勋。我之钦敬先生，除了《释录》之外，更因为先生开创性地发现了敦煌会计文书的巨大价值。

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史研究专家，不因会计属于一般人眼中的小学科而忽视之，这份情怀，无人可与比肩。

先生以细致的功夫，对敦煌会计文书，尤其是其中占最大数量的寺院会计文书做了细致的分类、缀合、整理和研究，让这些“研究古代社会会计史的稀世瑰宝”，绽放出了迷人的芳华，为后人研究铺平了道路。先生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迄今仍是敦煌会计文书研究方面无可逾越的高峰。

这座高峰，如同先生本人，俨然一道傲然树立不屈的脊梁，挺立于我们心中。

2018 年 4 月 26 日